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资料室

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

张 政 烺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征集天下书籍起，至四十七年基本完成，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装成36304册，共七部，前后历时近二十年。一个政府能出这么多经费，集中这么多学者来从事这项工作，应予肯定，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作出贡献的。

中国古代，早在西汉元、成二帝时，直到王莽当政（约当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曾派员至各地收集书籍，汇送中央整理、校勘。主其事者，先是刘向，其子刘歆继其业，校勘人员有名的为杨雄。向、歆父子所著《七略》、《别录》，对后世影响甚大。班固作《汉书》，删削《七略》，以为《艺文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的书。

东汉一朝，继续访求遗书，但是在末叶的军阀混战之中，为董卓军毁坏不少。魏晋之时，亦复有收书之举。隋代是一个新的统一局面，更有大规模的收书。所得图书，从洛阳运至长安途中，于三门峡多有沉没，很是可惜。唐初，再行收集。修《隋书》时，编定《经籍志》，于学术史亦大有影响。宋代也曾收集书籍，汇成《崇文总目》，惜未传下。今本是一个摘录本，极不象样。国家收书，在元明两朝，较前代略逊一筹。《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都不象样子。私家藏书者还不少，但不易保持长久，象宁波范氏天一阁保全了二百多年，名噪一时（四库馆开，范氏献书多至五百余种）。这为清代的收书树立了良好榜样。

及至清代，乃有《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之修，可以说是向、歆之后最大的一次古籍整理。清高宗以“稽左右文”自命，乾隆初年即有《明史》之刻。《明史》一书，顺治时开始，雍正时完成，至乾隆四年全书付刻。此后，又刻廿一史、十三经。乾隆三十七年，“上谕”购访遗书。开始，规模不大，其意图亦并非是要编修《四库全书》。次年，安徽学政朱筠（北京大兴县人），从其幕僚建议，奏请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代亡佚典籍。清高宗遂令军机大臣复议，于是才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这里简略的讲一讲《永乐大典》。明初帝王文化不高，未读过很多书，明成祖阅类书，如元人所作《韵府群玉》之类，发生兴趣，于是下令仿照它编《永乐大典》。韵书最早起于隋《切韵》，洪武时有《洪武正韵》，目的是为了统一赋诗时的用韵。《永乐大典》是按韵编辑的类书，二万二千余卷，类似今天的大百科全书。因篇帙太多，仅抄写一部，置于乾清宫。嘉靖时，宫中失火，明世宗曾亲自指挥将该书抢出。此后，决定重抄一部，由高拱领衔。当时亦曾有人建议刻版，但仅刻了点儿即作罢。《永乐大典》清代犹存，先置皇史宬，后移置于翰林院。咸丰年间，渐有散佚。庚子之时，八国联军进京，复遭焚毁。幸存的亦多被盗劫，分散在世界各地。今天北京图书馆所保存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了。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据原本及传抄本和相片，影印过，装钉为二百册。同时，台湾亦曾影印，内容稍有出入。《永乐大典》引书，体例不严，一部集子分散多处，按篇题分录于各类之中。但是亦有全部钞录一处的，如《水经注》四十卷，都在水字之下。

朱筠的提议，可以说是从学术上而言的。但是到了内阁，却成了例行公事。当时的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人，以之为公事来做，敷衍塞责。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应付皇帝的，倒也很有意思。

《四库全书》的编纂，分应刻、应钞、存目各类。当时刻书在武英殿，先用木刻，后改为木活字印。康熙时曾制铜活字印书，雍正时即以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初存放于武英殿的铜活字，多被盗窃，遂索性熔毁铸钱了。四库馆开创用木活字印书。主持印刷者为朝鲜人金简。武英殿之后为内务府造办处，武英殿实际就是指造办处。印的这些书叫武英殿丛书，因系以活字排印，故又称聚珍版丛书。印毕一批即刻一书单，类似今天的书目广告。尔后，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翻刻。武英殿印书时间很长，随印随销，脱销后不再版，故配成全份不容易。今所见聚珍版丛书，内容种数最多者为福建所刻。应钞的即以带朱栏白纸钞写，以供皇帝阅览。当时集中于文渊阁。明代即有文渊阁书目。藏书首页盖有文渊阁印（见宋版经典释文、元板梦溪笔谈）。明末焚毁。清初有文渊阁之名而无文渊阁之实。编纂《四库全书》时方才新盖。仿范氏天一阁式，阁前有一水池，以后所修诸藏书阁，均仿天一阁式。文渊阁本一直完好保存下来。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军打下山海关，北京告警，文渊阁四库全书装箱南运，先至上海，后又运往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反动政府将其携往台湾。

除文渊阁本外，尚有文津、文源、文溯诸阁本。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建筑完好。民国初年，熊希龄任热河都统，将文津阁本搬至北京，拨归北京图书馆。就质量而言，此部为最佳。因为清帝每年有半年住于热河，春末夏初即去，秋末围猎后方才回京。文津阁藏本即专供皇帝翻阅之用。清高宗读《四库》，好从中挑错，以炫其渊博。所以这一部抄写特别认真，有些书是纪昀亲自校改。可惜三十年代印《四库全书珍本》所选印者，不是文津阁本，而是文渊阁本。传闻前些年，台湾又把文渊阁本分集付印。

文源阁建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火焚圆明园，文源阁并所藏《四库》钞本，毁于大火。所存碑、碣等遗物，三十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

文溯阁建于沈阳，在今沈阳故宫博物院内。书品质较差而保存甚好。张作霖入关，带至北京，原拟付印，未成复运回沈阳。

除上述四阁外，尚有南方的文宗、文汇、文澜三阁。文宗阁在镇江金山寺，文汇阁在扬州大观堂（皆于十九世纪中期焚毁），文澜阁在杭州西湖孤山（曾焚毁一半，后已补齐），主要供读书人于阁内借阅、钞写。入夏，还要组织读书士子参与翻晒藏书。有机会参加晒书，这在当时是读书人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可以一饱眼福。《四库》有自己的款式，体例，清代东南一带刻书，其体例多同《四库》，即其底本乃自《四库》抄出。

北方士子欲阅《四库》，则可至翰林院读底本。《四库全书》实有八部，即七正本、一底本。今存者三部半。当时还搞了一个《四库全书荟要》，即《四库全书》的选本，共写两部，一部置于圆明园，已毁，一部置于故宫御花园内东旁小殿中，现在台湾，其目录为纪昀工笔书写。

存目为本书价值不大，不钞其书，仅作一篇提要存之总目中。然而就中亦可见到官僚主义弊病。譬如一些书往往是因卷帙浩繁，加工很麻烦，不问价值，概以存目了之。亦有所谓涉违碍之嫌者，四库馆臣为避是非，亦以存目了之。存目之中弊窦不少，有些颇有价值的书，即因存目未钞，以致亡佚。譬如《使鞑日录》，为宋邹伸之所作。系邹本人于南宋理宗时出使蒙古的日录。宋代使臣回朝，照例须有日录以汇报出使经过。邹出使之时，正当金灭，

其目录颇有史料价值。编纂《四库》时，该书自浙江采进。《四库》以存目处之，改为《使北日录》，后即亡佚。当然，有的书亦因存目而逃避了窜改，使本书原貌得以保留，反倒成了好事，譬如《元秘史》就属于这一类。

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有一部分文识浅陋者，但亦有当世知名学者。纪昀（晓岚）为实际主持者，次为陆费墀。纪昀的文化修养高，功劳最显。本所清史室王竹楼同志作过《纪晓岚年谱》、《朱筠年谱》，可以一读。

其他对《四库》有较大贡献者，为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姚鼐、翁方纲诸人。戴震对经部的编纂出力很大，不然搞不成这个样子。经学在清代有汉宋之分。汉代有古今文之争，许慎、郑玄等人都是长于训诂的古文大师。清人讲考据、讲训诂，都是归于这个路子。宋学的代表为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讲理，讲道，讲性。汉宋二学，宗旨不同。纪、戴二人都是汉学的路子，他们要提高汉学，排斥宋学。结果，汉学在《四库》经部上压倒了宋学。他们视汉学为正宗，寻机诋斥宋学。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杂记故事，诋斥宋学处颇多。汉学家对宋学的诋斥，固然不无偏颇，矫枉过正，但是，我倒还是基本同意他们的看法的。汉学务实，讲考据纵有失于零碎，然而毕竟有许多用处，尤其对我们搞古史研究是如此。后世许多学问是由他们发凡起例的。譬如天文、历法、地理，《尚书》、《诗经》、《左传》都有涉及，汉学家全作了研究，也是汉学家的功劳。宋学讲义理，其末流，实在无知。一切不讲，空谈心性。如果长此下去，清代的学术成就便无从谈起了。清初，从顺治至雍正，官修经书都是讲宋学的，四库著录汉学家的著作可谓反动，故而当时便颇受攻击。

《四库全书》史籍的编纂有邵晋涵。过去的史学，主要侧重于史籍的考订。子部则有周永年（书昌）博览群书。王念孙初无大声名，后因嘉庆初上折参和珅，名气大振。姚鼐为古文家，清代桐城派成就最大者即为姚氏。其后人将他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时的手稿刻成《惜抱轩书录》。翁方纲为《四库》写了不少篇提要。原稿旧存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翁氏是反汉学的，且很激烈，乃至破口大骂。

四库提要的体例基本仿效《七略》、《别录》，四库为了省纸，原书有子目的，悉数删去，有序跋者，亦多行删削。提要之作，可谓清初成例。康熙时，访求遗书，送入宫中时，照例先发南书房，由南书房官员写一简略的说明夹于各书，再呈皇帝。故而，乾隆帝亦令每一书均作提要，略述一书著者、卷数、梗概及得失诸项，原来的要求本不高，由于四库馆臣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取得很大的成绩。四库全书编成，提要亦汇集为《四库全书总目》。近代商务印书馆重印，以提要二字加于总目之后，题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在是画蛇添足。

《四库总目》为古今最大书目。宋《崇文总目》六十卷，《四库总目》为二百卷。每篇提要，均经纪晓岚过目修改。由于纪氏一人不可能对浩如烟海的群书一一翻阅核对，因而亦有提要由于修改而与原书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发生。不过从大处看，《四库总目》还是好的。《总目》编成之后，清高宗又令辑一简明目录。即削去存目，著录各书只存作者姓名，卷数及几句概述，以便检查。

清代版本目录之学很盛。道光时邵懿辰见书甚多，札记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上。士人辗转钞写，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以邵书为基础，加以本人所见，成《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从此找书的人就有所遵循。

前面是积极方面的评价，以下拟谈一谈消极方面的评价。《四库》编纂过程中，一个最严

重的问题，便是对书籍的禁毁。当时，分全禁毁，抽毁及涂改诸类。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官僚唯皇帝之命是从，而且往往加码以阿谀奉承。

《四库全书》对前人文字改动甚多。宋人的所谓“青词”，即道士用青纸写给上帝的表章，尽行删除。宋帝信道，供奉上帝，始于真宗。当时与契丹有澶渊之盟，稳定了局势却输了体面。真宗遂以道教为掩饰，此后风气大盛，道观遍于各地。徽宗时更是无以复加，徽宗本人即自称道君皇帝。故而当时文学侍从之臣集子中保存不少青词。明世宗亦信道教，严嵩作宰相，即因其擅写青词。固然青词是毫无用处的，但把古书的原貌改换了，却不好，这岂不是为坏人坏事销灭罪证？宋人文集中常有“致语”一类，类似今天歌舞演奏会上的报幕词，字句不多，文字整齐，亦悉数抹去。南宋初楼钥的《攻媿集》（宋本存十七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不少碑传、墓志铭于修《四库》时多被改动。涂改最大者为妇女部分。宋初沿袭唐风，女子可以改嫁，夫妻可以离婚。譬如王安石子王雱，患精神病，安石主张离婚，儿媳改嫁，以后还作亲戚走动。宋代女子有诰命，妻以夫贵，母以子贵，由皇帝授以诰命，确定品级身分。改嫁后，随前夫所得的诰命，可以带走。因此更有人愿意娶她，二夫死后还可三嫁。文人作碑传墓志把前夫及子女姓名皆写上，以此为荣。程朱以后讲理学，重名节，主张女人守节，从一而终。清代更发展到顶点。修《四库》时，便删削了所谓女人不守节的部分，统统改为从一而终。其办法是哪一个丈夫的高官，即算作哪一个的夫人，其它丈夫都涂去不记，实在荒唐得很。

关羽原谥壮缪，清高宗认为缪字不好，于是下令把《三国志》改为壮穆。

还有改译名的问题。辽、金、元史的译名都作了改动，这三史有旧本传世，故影响不大。有些书孤本流传，一经改动，无法复元。当然，原用字有些确有贬义，但经改动之后，无人能懂，把史料都破坏了。除改译名外，胡虏夷鞑等字皆被改易，上举《使鞑日录》不收，大约就是因为鞑字太多，改不胜改。

清代禁书，不始自修《四库》，康熙晚年即已很盛。顺治时大概也有。清初，有一个汉、满的民族矛盾问题。很多士人不仕清廷，他们的诗文中每每眷恋故国之思。元初、明初都有过类似情况，只是清初更加突出。雍正时搞得很厉害，乾隆时，更是大肆禁书。此亦为修《四库》的目的之一。据统计，乾隆朝先后毁书二十四次，共538种，13862卷。嘉庆时有所松驰，道光以后不复再见。道光时，杨凤苞等人收有不少禁书。同、光之间，傅以礼收录很多晚明禁书，且写了题跋一类文字。此后有刻禁书目录者。戊戌政变以后，各地兴起排满运动，有些治目录学者编辑禁书目录，收藏禁书，一时成为风气，禁书价暴涨。

禁书内容，一为顺康两朝文字狱所涉者，一为诋毁满清者，再为讲明末史事者。谢国桢先生著有《晚明史籍考》，言之甚详，可以读一读。此外淫书亦在禁毁之列。至于小说、戏曲，编撰《四库》时，以太浅薄为由不予收录。另有所谓文风不正者，亦被禁止。他如佛教藏经亦只收了一点儿，仅系与历史有关者。道经亦复如此，仅是年代较早且与史事有关的。所以《四库全书》，实在并不全。

嘉庆时，阮元曾募人钞书进呈皇帝。阮氏所录均为《四库》未收者，每书亦仿《四库》体例各有提要（光绪时，经傅以礼整理印成《四库未收提要》）。原书一直保存在宫中，赐名《宛委别藏》，今在台湾。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影印了一部分。

最后，讲一下续修《四库》的问题。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清廷腐败无能，赔款甚钜。以后，美国、英国退回一部分作为

文化事业的经费。日本则指定将其所退部分款由双方合组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设于北京，在北京建一人文科学研究所，续修《四库提要》，盖了一个藏书楼，藏书十六万册。当时续修《四库》，经费充足，一篇提要付酬金三十元，能购面粉十五袋。每篇提要写成，均打印若干份，除给作者外，还送到日本去。本所图书室现存有当时的打印稿。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日军杀害中国外交特派员，于是中方委员长柯劭忞率众退出。而日方则另外找人续修《四库提要》，到四十年代初期。其全稿闻台湾已编印成书。

后人读《四库提要》，曾有辨正之作。许瀚曾写过好几篇这类文字，叶廷琯的《吹网录》中亦有涉及。余嘉锡一生读书，以《四库提要》为指南，有许多不同意见，写出五百余篇文字，成《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胡玉缙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内容甚夥，有二千二百余篇。余氏书为一生读书之心得，已成一家之言，胡氏书则为辑录清人论述，可供读四库总目者参考。

（这是作者的一份讲课记录稿，由陈祖武同志记录，
发表时，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整理）

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 锺 翰

目前国内清史研究工作的形势一片大好，清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林立，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室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等等，其他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有清史课的，尚未计算在内；而且还出版有清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如《清史论丛》（已出三期）、《历史档案》（已出七期）、《清史译文》（已出八期）、《清史研究集》（已出二期）、《清史研究通讯》（已出二期）等，至于许多杂志期刊内大量刊登清史专题论著的，更多不胜举。比起解放以前，人才辈出，成就卓著，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即使如此，解放三十多年来，史学工作者对清朝历史的了解、研究和探讨还很不够，至今也没有一两部多卷本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思想，能写出过几百万字、贯串一代三百年间之事，而又比较全面、系统、详明的《清史》来。

过去，在二十年代，曾由一大批遗老遗少开始纂修，历时十五、六年，最后刊印出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不但立场观点反动，而且体例杂乱无章，内容舛误百出，当时就有人建议重修或进行一次大修改，但迄未见诸实行。重修清史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肩上。《清史稿》之不满人意，是既成事实，但及今重修清史，兹事体大，谈何容易？然而清史之有待重修或改写，亦系我们无法推诿之责，将如何而后切实可行，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窃以为在正式调动全国人力，集中全国资料，开始动笔撰写以前，应尽先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里仅就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提供大家参考。